

蜀刻唐人集之《张承吉文集》

张承吉文集十卷（唐）张祜撰 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刻本。框高19.7厘米，宽14.4厘米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张祜（约792—约853），一作张祐，祜、祐二字形近，极亦相混。明胡应麟《诗薮》云：“张祜字承吉，刻本大半作祐，览者莫辨。缘承吉字，祐、祜俱通耳。一日，偶阅杂说，张子小名冬瓜，或以讥之，答云‘冬瓜出瓠子’，则张之名审矣。”此后便以张祜为正。

张祜字承吉，清河（今属河北）人，一作南阳（今河南邓县）人，郡望清河。初依李光颜，后寓姑苏（今江苏苏州），曾谒白居易。长庆中（821—824）令狐楚表荐之，因至长安。但为内臣所抑，一说为元稹所抑，未被任用，遂至淮南。会昌中（841—846）曾与杜牧游。祜性耿介，数受召幕府，辄自劾去。因爱丹阳曲阿古澹有南朝遗风，于是筑室种植隐居于此，直到去世，故又号张处士。大约卒于唐宣宗大中年间，享年约六十余。

张祜早年多作宫体诗，以宫词得名。晚年则崇尚建安风骨，诗风转向朴实。《唐诗纪事》称其“短章大篇，往往间出。讲讽怨谲，时与六义相左右。善题目佳境，言不可刊置别处，此为才子之最也”。令狐楚表荐他时亦说他“凡制五言，苞含六义，近多放诞，靡有宗师。祜久在江湖，早工什篇，研几甚苦，搜象颇深，辈流所推，风格罕及”。可见张在当时很有诗名，并为一些有识之士所推重。

历代著录和传世的张氏文集，有一卷本、二卷本、五卷本和六卷本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张祜诗仅一卷。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亦说张祜“诗一卷，今传”。明朱警辑选唐人诗歌，于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刻成《唐百家诗》，其中中唐二十七家，第二十一家即《张处士诗集》，凡五卷。还有一部所谓翻宋十行十八字本《张处士诗集》，亦为五卷，与朱氏《唐百家诗》所收相表里。清刘世珩于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辑刻《贵池先哲遗书》，其中收有明正德本《张处士集》，亦是五卷。康熙四十一年（1762），洞庭席启寓琴川书屋辑刻《唐诗百名家全集》，其中有《张祜诗集》二卷。扬州诗局所刻《全唐诗》，收张祜诗亦为二卷。吴寿昉所辑吴騫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卷五，谓“《张处士诗集》凡六卷，无序目”。由此可知，唐以来传世的张承吉集多为一、二、五、六卷本，尚未见有十卷本流传。

则为宋蜀刻十卷本，其珍稀价值不言而喻。传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两个系统：一为十一行本，约刻于南北宋之际，今存骆宾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诘三集；一为十二行本，约刻于南宋中叶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种，其中就包括十卷本的《张承吉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书中遇“构”、“沟”、“慎”等字皆不缺笔，而于光宗赵惇御名“惇”字和嫌名“敦”

字则皆缺笔避讳，表明其刻已届南宋中期。与现存蜀刻唐人文集相勘核，此本版式行款、字体风格、印纸墨色如出一辙，因疑其为丛刻散出者。据程有庆对蜀刻唐人文集丛刻的考证，宋王楙《野客从书》卷五，出现了《唐六十家诗集》一名，但未说明由谁在什么地方出版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称：“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。”王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（1213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从书》分门类聚，钩隐抉微，考证经史百家，下至骚人墨客佚草佚事，细大不捐。所记《唐六十家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、八年已经行世，当为亲眼所见。陈振孙虽晚他三四十年，但陈为著名的目录学家，所谓“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”之说，绝非无稽之谈。这证明四川眉山地区于南宋中叶刻过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明代杨士奇等核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卷十，仍著录两部残宋本《唐六十家诗》，说明历史上确曾有过《唐六十家集》丛刻行世。据此，此蜀刻十卷本《张承吉文集》当是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中的一种，故此本可定为“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刻唐六十家集本”。

此本与其它存世的宋蜀刻唐人文集，在元代均藏宫中，开卷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长方印

鉴可证。明、清亦为内府藏书。清初有名刘体仁者，顺治进士，历官吏、刑两部郎中，可以入阁看书，随看随借，便将多种蜀刻唐人文集带回家中。此本钤有“颍川榴考功藏书印”，刘考功即刘体仁。

（李致忠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

